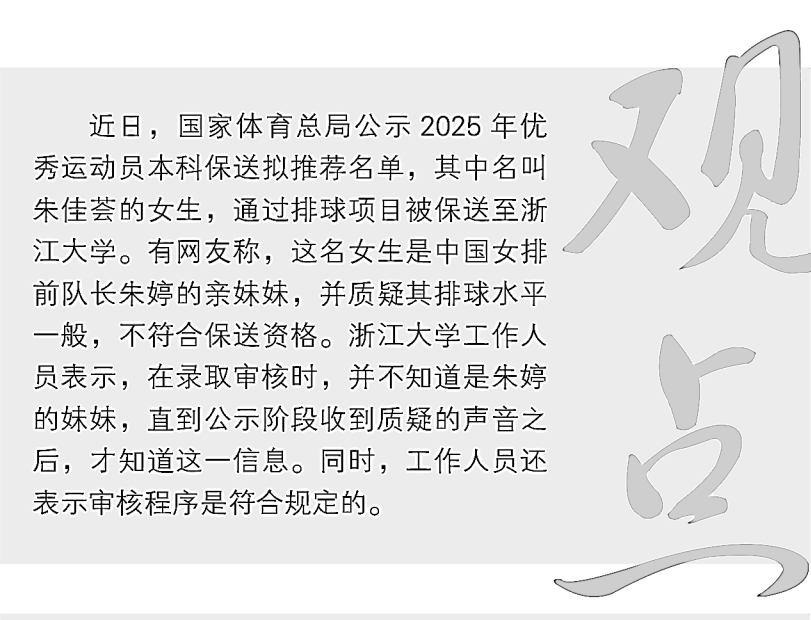


朱某荟保送浙大 要看到“公平焦虑”



保送争议无需扯上朱婷

审视这一起保送争议，因名人效应被放大到舆论场，其实无关朱婷。保送生既不能因名人而沾光，也不应因名人家属而被苛求，唯一标准在于是否符合规则、程序是否正当。

朱佳荟是否符合保送要求，其“运动健将”身份从何而来至为关键。

而根据评定时适用的《排球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》，全国联赛、全国锦标赛中，第 9 至 12 名队伍获得 4 个“运动健将”名额。朱佳荟 2024 年随河南双汇女排队参加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，获得第 9 名。根据中国排球协会官方网站消息，2024 年 12 月 23 日，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下发文件，河南两人获得运动健将等级，朱佳荟系其一。按照这个标准，朱佳荟成为“运动健将”在当时是合规的。

有网友称，朱佳荟担任接应位，为替补出场。河南省体育局工作人员

说，球队觉得她作了贡献，然后申请到体育局，体育局上报给国家体育总局，最终由国家体育总局审批。“有可能主力队员已经都拿到运动健将等级了，替补也可能会上场。”河南省体育局球类运动中心工作人员也表示：“朱佳荟参加锦标赛，她就有资格了。”

不论是运动员，还是学科竞赛，任何领域的保送入学名校，都会牵动公众对于教育公平的敏感神经。因此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以公平透明的规则和合理正当的程序，来守护人们心中的正义，避免暗箱操作疑云。

信息的透明度，是社会的能见度。只要不是无中生有的质疑和监督，都有助于实现保送的公平公正。及时回应各种质疑，也是相关各方应尽之责。如果所有流程都符合规定，实在没必要搭上一位名人来“借势”传播。

引发公众对“特权通道”的猜疑

其实这场争议的核心，是公众内心存在的“公平焦虑”。朱婷作为中国女排的标志性人物，在国际体坛享有极高声誉，她的名字本身就带有强大的号召力。正因如此，当公众看到“朱婷妹妹被保送”的消息时，难免会将两者联系起来。当“朱婷妹妹”的标签与“排球健将”“保送名校”结合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“裙带关系”的可能性。在公众认知里，名人及其亲属似乎更容易获得资源倾斜，这种刻板印象加剧了人们对教育公平的担忧，进而转化为对此次保送事件的“公平焦虑”。此次事件虽然程序合规，但仍引发了公众对“特权通道”的猜疑。

要缓解公众的“公平焦虑”，需从制度完善与社会认知两方面入手。一方面，相关部门在招生、保送等工作中，要做到程序规范、透明，防止权力寻租和违规操作，维护教育公平的底线。同时，不能止步于程序合规——程序合规仅是底线，实体公平才是关键。朱佳荟若真凭合规程序入学，其“朱婷妹妹”的身份不应成为“原罪”；反之，

若有违规证据，则须一视同仁追责。

这些事件虽属于个别现象，但仍对社会心理产生影响。试想，当公众看到极个别人可能通过非正当途径获取教育资源，难免会对规则的公正性产生疑虑。这种疑虑在“名人相关事件”中被进一步放大，即使是偶发的公平争议，也可能在公众心中留下长久阴影，动摇对教育公平的信任。

另一方面，要倡导理性讨论，减少公众的焦虑心理。公众监督是健康的，但应基于事实而非预设立场，不应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就认定存在不公平现象。公众在表达关切的同时，要尊重事实，避免被情绪左右，共同营造健康、有序的舆论环境。

公平从来不是静态的完美状态，而是动态的制度演进过程。对于个案引发的讨论，既要警惕“标签化”思维的刻板解读，也要以“显微镜”精神审视制度细节，让每个细节都经得起阳光检验。

综合自红星新闻、红网等
(马九月 整理)

别把违法犯罪经历当成流量密码

□ 杨玉龙

据媒体报道，“如果你们还想听我讲在‘里面’的故事，还有我当‘酒托’的经历，记得进粉丝群，给我点个灯牌……”近日，2018 年曾因参与“酒托”诈骗被通缉，因外貌出众被网友戏称为“最美通缉犯”的卿晨璟靓出狱后开启直播大谈服刑经历。随后，相关平台因其违反平台规定，对账号“卿晨璟靓”作出封禁处理。

拿服刑当“卖点”博流量，甚至以此为“荣”，这样的做法显然是欠妥的。对于刑满释放人员以及有吸毒、侵害未成年人等行政处罚记录者从事网络直播和电商业务，目前法律并无明确禁止的规定。但其所带来的社会负面效果不容小觑。毕竟，其行为会对受众，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价值观造成极其负面影响，甚至可能导致不良社会风气的蔓延。

也正如有受访专家表示，一些网红通过“揭秘监狱生活”“披露犯罪细节”博取流量，会使人产生“犯罪有利可图”的错觉，一些人出于猎奇心理或经受不住利益的诱惑更容易突破法律底线。事实上，确如其言。尤须注意的是，“问题”网红身上的“卖点”让一些 MCN 机构（网红经纪公司）趋之若鹜。还有些“自媒体”会以此为流量进行宣传推送。

整顿农村滥办酒席现象要坚持结果导向

□ 唐伟

据媒体报道，老母猪下崽要办酒，房子装修要办酒，买辆车要办酒，病愈出院要办酒，甚至跳大神也办“消灾酒”……实在找不到理由，就说“为答谢亲朋好友对我家的关心厚爱，特在 XX 地方略备薄酒一杯”。记者采访发现，部分地方农村滥办酒席之风屡禁不止，不少群众为了人情往来背上沉重经济负担。

酒席过多过滥，人情往来的标准也越来越高，“在外打工三万三，回家吃酒荷包干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贵州省天柱县石洞镇红坪村农民杨爱东说，吃酒席随礼已经成为不少农民的沉重负担，有的农户一年送出去的礼金接近 2 万元，挣的钱刚刚“够本儿”，有时甚至“入不敷出”。以国庆节为例，《2022 职场人国庆长假调查》数据显示，职场人在国庆期间给出的“份子钱”，人均高达 2369 元。其中，给出 1001 元至 3000 元的职场人最多，占比 33.6%。把“份子钱”打下来，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愿望。

尽管各方对滥办酒席的危害性深恶痛绝，对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有体会，不过愿望是一回事，行动又是另一回事，在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和环境影响下，如此乱象不但未能实现好转，在一些地方变得更加严重。从抽样调查的情况

看，滥办酒席在一些地方未得到根本治理，反倒有不断恶化之势，以至“尽快收回份子钱”的攻略在当地大行其道。

滥办酒席的整治应以结果为导向，采取堵疏结合的方式。在预防和干预方面，要充分利用年轻人整顿酒席的积极性，以及全社会共同愿望这个深厚的基础，以村规民约的方式形成最广泛的共识，在界定酒席的范围和标准后，充分利用民间自我管理、自我约束的能力，发挥各基层组织成立的红白喜事理事会的作用，变放任自流为有效管理和规范。同时政府的有效引导，可以效仿反食品和粮食浪费的做法，将滥办酒席纳入法治的路径中来，给久治不绝的不良风气来一剂猛药。

在此基础上，以减负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应当尽快配套到位，以减轻人情负担来遏制置办酒席的冲动。如以村（社区）为单位建立统一的红白喜事大厅，为民众操办红白喜事提供场地保障，也为提倡和实施文明简朴的操办提供条件。就像学生统一穿校服一样，避免了攀比也能较好的执行收礼标准。另一方面，为符合条件的酒席置办者提供一定数量的奖励，或者承办饭店给予一定的补助，对执行节俭办事的家庭给予精神激励，提高其执行相关标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形成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。